论历史学派

汤在新

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本世纪初流行于德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中，对历史学派的评价早有定论。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表面现象并不是直接合而为一的，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事物的表面形式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正是依据这点从总体上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区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前者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后者则是描绘经济关系的表面现象。就这个观点来说，历史学派无疑应属于庸俗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

历史学派从未研究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自己独创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其经济理论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各种观点、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各种观点的杂凑。例如，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这本被誉为历史学派的奠基著作就是一个标本。这本著作讨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部分的《总论》是按萨伊的“三分法”分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三章，生产论也是以萨伊的三要素论为基础的，但是，地租论却采用李嘉图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级差地租论，而危机理论又是依据于与萨伊和李嘉图相对立的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学派是“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他们“阉割一切体系，抹去它们的一切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①

历史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是以他们对方法问题的阐述为依据的。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于，以所谓“历史的方法”否认客观经济规律及其对处于同一生产方式下的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意义。例如，克尼斯的《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就以经济生活是不断变化的、从而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改变为依据，宣称经济规律只具有暂时性，理论只具有相对性。他论证说：“经济生活和所得的结论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种论证是以具体经济生活的事实为依据，而所有的结果都带有历史解决方案的印记。经济学的概括，仅仅是历史的说明和真理的逐步显现。每一步骤是发展的具体阶段中所认识到的真理的概括。没有一个公式也没有一批这样的公式能够算作是终极性的。”② 克尼斯不懂得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固然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否认客观规律的真理的存在和人们对它们认识的可能性，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的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事实上，历史学派的代表们也明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克尼斯同时代的希尔德布兰德就曾宣称“经济科学无需设法在大量经济现象中寻找不变的、相同的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律”，并提出“把政治经济学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学说的总汇”③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施莫勒同样断言：“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④以“历史的方法”来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从而埋葬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派不同于其他经济学派的基本特征。正是针对这点，马克思指出，历史学派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坟墓”，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阶段”。⑤

就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联系来说，历史学派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大倒退。对于经济学说进行科学的历史考察，是必须揭露历史学派的这一庸俗实质的。但是，我们今天与马克思所面临的任务已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学派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对历史学派的批判已不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在今天，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似应开阔一些，例如，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种探讨和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并不就是矛盾的，因为两者研究的角度是不相同的。

历史学派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将结束，而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开始发展；到了历史学派的晚期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作为德国这个重要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推进德国经济发展的思路，总结了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如果说德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的话，那末，就不应忽视历史学派对推进德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历史学派是与当时的权威理论相对立而产生的。在历史学派兴起的时期，欧洲占居统治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限度内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为经济自由主义，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封建经济并夺得国际市场，作了充分的论证。但是，古典学派依据其理论而提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政策，却不利于象德国这一类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在19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英国以其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倾销大陆，使在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保护下开始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族工业日益陷入绝境。然而，当时德国的理论界并未从现实中作出应有的结论，而继续推崇古典经济学，信奉它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正如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在1841年所说的，德国“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如有异议，则被诋毁为“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⑥显然，不破除这种迷信，不打破这种经济思想上的禁锢，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就不可能有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学派，特别是它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从本国实际出发，不盲从，不屈服于“科学最高权威”。历史学派的兴起，固然是由于揭示了阶级对立原理的古典学派不符合与容克地主相勾结的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同时也是由于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派理论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历史学派及其先驱者发起的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同于当时在英国掀起的围绕着李嘉图理论特别是其体系的基础劳动价值论而展开的大论战。德国学者所关心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只是这些原理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应用及其实践效果。李斯特指出，流行学派即古典学派学说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它所固有的“世界主义”，它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不顾及“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特有利益和情况”⑦。他认为，各国应充分考虑到自己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依此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象英国那样的农工商业得到综合发展的国家，而对处在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并在先进国家的竞争下需要采取保护政策的德国来说，则是不适用的。历史学派继承了李斯特的传统，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界主义”依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罗雪尔指出，古典经济理论依以为出发点的是一些抽象概念，如“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所有的人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事务上都同等地熟练和自由”，等等。他认为，运用这种抽象法建立的体系，“到底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它不仅在过渡到实践上、而且即使在已完成的理论上，我们都必须转而面对实际生活中无穷的、多种多样的变化。”⑧毫无疑问，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运用抽象方法所开创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否定，导致历史学派滑向庸俗经济学。不过，就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应该说，李斯特着重批判鼓吹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历史学派的从“世界主义”立论的基础即方法论展开的批判则完成了从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的任务，从而才为探寻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扩大了思路。事实上，对于德国面临的这个解放思想、探寻新路的历史任务，不仅李斯特是明确的，而且历史学派的代表们也是十分重视的，罗雪尔甚至把完成这个任务看成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首要目的。罗雪尔在他的主要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他的著作的“最高奢望是使我们的读者们，在不受任何世俗权威的影响，公正地权衡了一切事实之后，多少能为自己发现这种指明方向的法则。”⑨

历史学派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同时，提出创立旨在促进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说。李斯特从民族利益即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或称“国民经济学”）的概念，指出国家经济学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⑩。罗雪尔同样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论述各国的物质利益。”它的任务是说明一个国家现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制定出某种普遍适用的理想方案。因为，“一种经济思想不能适合每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材一样。”⑪施莫勒对这种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国民经济”，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一切个体经济基于自由的交换和贸易关系而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合这个基础上”，同时也是“建立在城市、省和国家之统一的经济设施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国民经济只不过是近三百年的产物而已”。在施莫勒看来，流行经济学“把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千千万万的个体经济总起来叫做‘一个国民经济’”⑫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

历史学派所考察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指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已有较高发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展并形成了“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则是处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我们知道，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抽象掉了资本主义各个国家的具体特点，研究这些国家共同的经济基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依以运行的规律。古典学派所开创的这种科学的抽象研究，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质，对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然而，历史学派却不懂得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和以科学的抽象理论为指导之间的联系，从而把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并否认把特定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在历史学派的迷误中，实际提出的问题是：在运用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时，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要从本国所处的发展的特定阶段出发。

德国历史学派力图推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应全面考察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早在李斯特的著作中，生产力概念就几乎包罗了一切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李斯特看来，“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之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⑬施莫勒同样强调应研究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的种种社会关系。”他认为，除了研究构成“国民经济问题的核心部分”——“诸如价值、价格、货币、信用以及贸易现象等”——之外，还应弄清“国民经济的具体特征”，其基本内容为，“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关重要的是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果采取措施来增加其中的收益；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国民财产和资本的分配状况、分工和阶级构成状态、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制度对于个体经济和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⑭罗雪尔则从方法上论证说：“国民生活，象一切生活一样，是整体的，它的各方面现象相互之间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因此，要科学地理解它的一个方面，就必须同时明了它的一切方面。”⑮

历史学派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既应研究“经济制度”，也应研究政治制度、法律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同时还应考虑科技、文化乃至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观点对于考察一国经济的发展及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固然说明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物质生活关系，从而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但是，它的特定任务不是要说明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更不是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说明这些因素。就这个意义说，历史学派要求建立一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全面探讨影响一个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的“国民经济学”，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历史学派由于否认政治经济学对研究国民经济的指导意义，忽视抽象方法对于建立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因而没能建立起这样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错误还在于，对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并因此而滑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历史学派在考察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发展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是从心理和道德因素优先于物质生产的观点出发的。施莫勒认为，“经济的文化世界”从其产生就应归功于“人们的精神力量”。他还说：“我们称作‘经济’的，是指由互相联系的个人所构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联系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⑯他因而认为，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才能得到解决。新历史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桑巴特则把精神因素看作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形成的“策动的力量”。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他解释说：“我们对于那由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⑰桑巴特针对着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限制竞争的传统观念，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征服和营利”，即追逐利润和力图通过竞争征服一切的行为，而他所说的“市民精神”则主要是指“一种最重要的社会道德”——“对契约的忠实”⑱。桑巴特认为，这种“市民精神”会给予新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安定的秩序，从而会弥补企业家的征服和营利精神对旧关系的冲击所带来的震荡。毫无疑问，历史学派的观点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它把精神因素置于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不懂得、更没有说明某种经济意识如“资本主义精神”依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但是它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即一个新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必须破除起着阻碍作用的过时的观念，建立起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点或如桑巴特所说的“经济意识”。

历史学派在理论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于，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领导作用。早在李斯特的著作中就已明确指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⑲他的后继者施莫勒则写道：“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他还依据他对“国民经济”概念的说明，指出：“企图设想有一个自然的国民经济，设想它超然存在于国家之外，完全脱离一切国家的影响，那纯粹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⑳。桑巴特虽然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策动的力量”，但他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有在国家里面，并通过国家，才能发生作用。他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考察了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诸如军事、工业政策、商业政策、交通政策、殖民地政策、教会政策、工人政策、财政政策、铸币政策和货币本位政策等，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体现着资产阶级意志的“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创建者，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

古典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把国家降低为资产阶级的“守夜人”。与此相反，历史学派，从它的先驱者李斯特到集大成者桑巴特，却始终一贯地推崇国家，这是因为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情况远远不同于英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还分裂为38个彼此独立的小的邦国。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李斯特曾痛心疾首地诉说道：“德国境内的三十八道关税和路捐线使内陆交通瘫痪，这如同人体上的每一部分被结扎，血液不能够畅通流入其它部位一样。”他举例说，在德国的邻国，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半岛，从荷兰边界直达意大利，贸易通行无阻，“碰不见一个收税官”；而在德国，“要从汉堡去奥地利或从柏林到瑞士做生意，就得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经过十个国家，研究十种关税和路捐条令，缴纳十次过境税”。[21]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就成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前提。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历史学派即新历史学派继续推崇国家，开始是为了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期则服务于垄断资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德国，能在短时间内超过英法等国，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德国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政权并依靠它来推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

历史学派及其先驱者在思想领域方面对德国经济发展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在于：它使德国理论界从国外传统学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辟了探寻经济发展道路的新的思路；它要求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从本国所处的发展的特定阶段出发，制定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它强调一国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判定哪些因素对本国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依据。历史学派虽然没能推进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但它提出了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富有启示性的思想。

注释：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58页。

②克尼斯：《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转引自季德、利斯特著《经济学说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2—413页。

③希尔德布兰德：《现代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转引自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卷，第468页。

④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59页。

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58、557页。

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页。

⑦同上，第109页。

⑧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25—326页。

⑨同上，第330页。

⑩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9、106页。

⑪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23、327页。

⑫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44—345页。

⑬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3页。

⑭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44页。

⑮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23页。

⑯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41页。

⑰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2、215页。

⑱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2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9页。

⑲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7页。

⑳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转引自季陶达主编《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44、345页。

㉑转引自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1987年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第76页。

（责任编辑　傅殷才）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